

原史：1945年以后的李守信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6-04-2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娜仁格日勒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4945/00009382">https://doi.org/10.14945/00009382</a>

# 还原历史：1945年以后的李守信

内蒙古大学 娜仁格日勒

内容提要：正如在其自述中开宗明义所指出的，在内蒙古近代史上，李守信“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反面人物”。其典型意义不仅体现在满洲国时期的种种行为上，也充分表现在日本战败撤走后，李守信坚持自己的立场，支持德王的独立运动。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资料，对于其1945年以后的活动进行还原，包括从担任国民党第十路军总司令到蒙古自治政府（西蒙自治政府）蒙古军副总司令，追随德王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逮捕引渡给中国，1970年去世，骨灰的管理等内容。

关键词：李守信，德王，蒙古自治政府，国民党，中国共产党

## 序

李守信（1892.7.11-1970.5.？），原名那孙巴雅尔，又名李义，到热河游击马队后使用李守信这一名字，字子忠，系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朝阳）蒙古人，上将军衔。曾任东北军骑兵第17旅团长、旅长。自1933年与日本合作后，历任热河游击师司令兼经、林留守司令<sup>1</sup>，察东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察东警备军司令。1936年以后，在德王政权中一直担任军政要职（照片1-6）。李守信的兵力是德王政权的军事支撑。

日本战败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主要活动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1949年，到阿拉善与德王一起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却遭失败，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捕遣送回中国关押，在狱中度过近15年的漫长岁月。1964年12月28日，73岁高龄的李守信被特赦出狱（照片7），1970年5月于呼和浩特辞世。

在自述中，李守信详细回顾了从幼时到1945年8月撤离张家口逃至北平的半生经历。自述是在出狱后开始的，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中止<sup>2</sup>。或许是出于李守信经历的复杂性，至今没有相关的专论或专著的发表。这位曾经身为德王政权2号人物的重要存在，仿佛已被世人遗忘。这不能不说是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缺憾。鉴于此，本文尝试梳理其1945年以后的活动轨迹及晚年生活等片段，希望能够对于这位历史人物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 一，1945-1947年间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活动

日本投降时，德王和李守信都在蒙古自治邦政府所在地张家口。从张家口撤走北平后，李守信出关到东北组织军队，一时，队伍发展比较迅速。

### 1，从张家口到北平：是什么导致李守信倾向了国民党

1945年8月15日，在张家口的李守信从日本人那里得知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时，其“蒙古军”（照片8）的大部队在厚和附近，由宝贵廷带领，小部在宣化、察北和绥东。他立即电话指示宝贵廷将部队先集中到厚和，晚上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下午，有八路军交来陈毅的劝降书，李守信让送信人将信件转交日本驻蒙军军部，随后自己也去军部请示对策，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投降美国和蒋介石，绝不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我们走了以后，希望你们把张家口交给国民党，千万不要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他们不讲信义”<sup>3</sup>。

<sup>1</sup>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守信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1985，第11-12页，第24页。经、林留守司令，即经棚、林西留守司令（《李守信自述》，第128页）。

<sup>2</sup> 上述书，第352页。

<sup>3</sup> 上述书，第338-340页。

但此时，李守信并未也不可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15日晚，他再次电话指示宝贵廷率领部队速来张家口，然而电话线中断，此后再未能取得联系，到17日晚上也没有等到宝贵廷的到来。原来，17日大青山的八路军攻打厚和，宝贵廷进行抗拒，与八路军展开战斗，替傅作义守住厚和，和包海明一起投归了傅作义<sup>4</sup>。而后来，宝贵廷的部队受到傅作义等军阀大汉族主义的挤压控制和分化削弱，终被瓦解，也致使李守信重回厚和重新率领蒙古军队的愿望被迫完全断绝<sup>5</sup>。

15日当晚，德王告诉李守信，蒋介石来电报指示他们坚守岗位。德、李商量对策后，决定派乌勒吉敖喜尔与八路军联络。但是，17日，正当李守信在德王公馆时，两架苏联飞机在张家口上空扔下炸弹后撒下大量传单，上面指名责骂德王是卖国贼、蒙奸，德王说：“这条路看来已经不行了”<sup>6</sup>。进而，德王派出的联络员遭苏军的扣押等蛮横对待，苏军在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张北等占领地的烧杀抢掠等胡作非为<sup>7</sup>也导致德、李倾向了国民党。换言之，客观地讲，日本战败后，正在德王和李守信犹豫不决时，苏联军队的恶行成为导致他们做出最后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

18日，苏蒙联军由张北向张家口发动进攻。19日，德、李在日军保护下乘坐火车离开张家口。20日到达宣化时，接到蒋介石将蒙古军改编为第十路军的命令和任李守信为总司令的委任状。李守信当即着手布置在察东和晋北各县招收兵马。李守信后来认为，由于无法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也牵挂北平的财产，没有亲自组织和带领队伍，导致了日后“蒙古军的四分五裂”。其实，在傅作义等大汉族主义军阀的压迫下，即使李守信亲自带领部队，也未必能逃脱被分割吞并的命运。曾经拥有2万名士兵的蒙古军总司令，变成了光杆司令，无一兵一卒。同20日在宣化时，再次接到陈毅催促谈判投降的信件，被李守信以“等研究考虑以后再答复”而拒绝<sup>8</sup>。21日，到达北平。

## 2，被迫为国民党成立部队

李守信出关集结部队，是他到达北平半年以后的事情。这期间，他一直强烈梦想着回到厚和，重新率领旧部队。

### （1）李守信欲重新掌握蒙古军，傅作义作梗

到达北平后不久，李守信随同德王以及吴鹤龄、乌古廷、超克拔都尔（chogbadaraqu，陈绍武）等经西安飞往重庆，9月3日，会见蒋介石。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李守信于10月初旬末，先于德王返回北平<sup>9</sup>。在北平，李守信与玛尼巴达喇有过接触。当时，玛尼巴达喇为前往重庆会见蒋介石而停留于此。

另一方面，鉴于德王、李守信与国民党的接触，中共于10月23日发出了指示，强调应该消除其产生的影响，防止国民党对德、李的进一步利用<sup>10</sup>。1945年11月，中共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通缉令，“通缉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王、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伪蒙疆政府政务院长吴鹤龄”<sup>11</sup>。这表明，此时中共已经将德王和李守信公开作为敌对势力了。

李守信从重庆回到北平后，期盼回到绥远重新领导军队，但是一直未得到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和旧部宝贵廷的联系，此时宝贵廷率领着蒙古军的大部队。后得知傅作义不愿他回到厚和重新领导蒙古军。1945年12月上旬，在北平见到傅作义时，傅作义向李守信解释了认为他回厚和不相宜的原委<sup>12</sup>。这等于傅作义当面拒绝了李守信重回绥远的要求。事实上，日后傅作义将宝贵廷率领的蒙古军的大部肢解分割，窃

<sup>4</sup> 上述书，第341页。

<sup>5</sup>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伪蒙古军史料》（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8辑），1990年，第96—98页。

<sup>6</sup> 《李守信自述》，第340—342页。这一情况，还可以与德王的忆述等相印证（德穆楚克栋鲁普《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过》，《德王在阿拉善》（阿拉善盟文史第五辑），第47页；德王自述第190页；《伪蒙古军史料》，第74页也有同样的记述。

<sup>7</sup> 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32—436页。

<sup>8</sup> 《李守信自述》，第242，270，344，347页。

<sup>9</sup>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1984年，第141页。

<sup>10</sup>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64页。

<sup>11</sup> 内蒙古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公安工作大事记述》（繁本第一稿，征求意见稿），1986年，第11页。

<sup>12</sup> 《伪蒙古军史料》，第94—96页。

为己有。李守信也曾请求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拨给旧部下宋万里、刘继广的部队一些给养，遭拒绝。部队后来也被孙连仲乘机吞噬<sup>13</sup>。

## （2）国民党再三催促威胁，不得已出关集结队伍

与此同时，马汉三不断逼迫李守信去关外成立新队伍。11月，戴笠到北平，召见并指示李守信到锦州找东北行营接洽成立队伍事宜。于是，李守信经锦州到北票，原打算在北票召集兵马，却遭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的阻挠，未能成立队伍。12月初，回北平。

此时，正值蒋介石和戴笠来北平。蒋和戴分别会见了李守信，再次要求李守信出关成立队伍，一切补给由东北行营发放<sup>14</sup>。然而，李守信仍一直未动身。

1946年3、4月间，戴笠又来北平，再次催促李守信出关。李守信不得已孑身一人离开北平前往锦州，在锦州面见熊式辉并按照其指示在北票成立了“热辽边区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主要在热辽边区招收兵马。前文已述，李守信强烈希望回厚和重新领导旧部，然而傅作义一直不允许，无奈，只有回东北重新成立队伍。在北票，很快聚集了3千人马。其中包括旧部刘继广、李树声的若干人员；依恒额（依绍先）在阜新招收的1,700人马；开鲁县长张念祖于1946年1月16日，被共产党打败，逃离开鲁驻扎北票<sup>15</sup>，此时率领队伍500多人投奔李守信<sup>16</sup>。

但是，由于国民党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的排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成立不久，便被迫迁往东部的阜新。1946年6月，蒋介石来北平时再次召见李守信，指示他在东北行营的支持下继续扩大队伍<sup>17</sup>。李守信回阜新后，又有队伍相继来投。原库伦旗保安队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sup>18</sup>第2师14团驻扎在库伦旗，7月中旬，库伦旗札萨克王爷罗布桑林沁<sup>19</sup>的心腹乌力吉巴图在札萨克指示下率领600多人马叛变，前来投靠李守信，被收编为热河边区骑兵5团，乌力吉巴图任团长。在此次事件中，罗布桑林沁被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2师师长那钦双和尔下令秘密逮捕并杀害。8月，李守信军攻占开鲁<sup>20</sup>。

原奈曼旗保安队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2师15团，驻扎在奈曼旗。9月22日，15团顾问、原保安队副司令洛布登率团叛变。此次事件是由奈曼旗王爷苏达那木道尔吉策划领导的。洛布登带领1,300多人马请求李守信收编。国民党东北行营任命奈曼旗王爷苏达那木道尔吉为“人民自卫军”副司令<sup>21</sup>。至此，李守信部队下设有4个支队，即依恒额部队、张念祖部队、库伦旗保安队以及奈曼旗保安队，总数至少5,000人马。

## （3）对清卓里克图的策反

李守信为扩大队伍，1946年7月，从北票捎信，准备在乌丹沙窝给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4师师长和子章（清卓里克图）空投枪弹物资。信件在途中被共产党公安机关扣留，并冒充和子章与李守信多次联络，诱捕了前来的联络人<sup>22</sup>。李守信对于和子章的策反不止一次，而是反复多次地进行。在同7月，李守信派特务给和子章送去任命他为“国民党昭乌达盟自卫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印章，被共产党截获，和子章一直不知此事。8月成立的东北行营蒙旗联防指挥部，曾派军统特务吴化民潜赴林东策反和子章，也被共

<sup>13</sup> 同前注11文献，第68-69页。

<sup>14</sup> 同前注12文献，第98页。

<sup>15</sup> 同前注11文献，第19页。

<sup>16</sup> 1946年1月，张念祖率队伍1千多人进攻奈曼，并恢复了绥东县，率部在奈曼盘踞。不久，阿思根率蒙古骑兵与奈曼保安队一起攻打大沁他拉，张念祖败逃，后投奔李守信（奈曼旗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奈曼旗文史资料》第1辑，出版年代不明，25页，43页）。

<sup>17</sup> 同前注12文献，第122-123页。

<sup>18</sup> 关于内蒙古骑兵的演变过程参考娜仁格日勒「中共による内モンゴル騎兵部隊の解散までの軌跡」（『日本とモンゴル』第49卷第1号、2014年9月）、杨海英『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文藝春秋、2014年）。

<sup>19</sup> 库伦旗札萨克王爷罗布桑林沁原是喇嘛，其弟是该旗札萨克，八路军攻入库伦旗时枪杀了其弟弟。此后，罗布桑林沁还俗当了札萨克，为给弟弟报仇，率军投奔了李守信（同前注11文献，第36-37页；《伪蒙古军史料》，123-124页）。

<sup>20</sup> 赤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子章与蒙骑四师》，1989年，第46页。同前注11文献第37页记载，李守信攻占开鲁的时间为1946年11月。

<sup>21</sup> 同前注11文献第37页。

<sup>22</sup> 前述注11文献，第56页；《和子章与蒙骑四师》，第45页。

产党中途秘捕。11月，德王、李守信捎口信给和子章，希望他谋反。国民党93军军长卢浚泉亲自写信给和子章，以德王、李守信为蒙古民族而战的旗号，劝其反叛，但送信特务也被共产党公安处逮捕<sup>23</sup>。

从1946年4月5月到11月12日间，已被共产党掌握的蒙古人队伍接连发起叛变事件。除了上述的骑兵2师14、15团以外，主要有：阿鲁科尔沁旗公安科长孙根全率保安队120多人叛变，和子章部下的蒙骑4师第一支队长兼35团长额尔登格与其兄阿鲁科尔沁旗德布勒庙葛根塔拉巴<sup>24</sup>以及连长阿力本嘎，道敖尔布的叛变<sup>25</sup>，34团副团长兼3连长韩桑杰<sup>26</sup>以及3连副连长丁和尔札布，2连长乌尔塔分别率部队叛变，36团部分官兵以及37团<sup>27</sup>长洪富升格与参谋长僧格嘎日布率部队的大部分士兵叛变<sup>28</sup>等十多起武装叛变。蒙骑四师的这些叛变队伍中，仅额尔登格部队就达500多人，4师总叛变人数达1千余人，均被李守信收编。

此外，小规模叛变也很多，都投奔了李守信。这些军队与科左中旗的苏和巴特尔，库伦旗的罗布桑林沁，奈曼旗王爷苏达那木道尔吉的部队遥相呼应，总人数曾达到3千人。10月，额尔登格、塔拉巴联合开鲁蒙旗自卫军达理扎布欲夺取重镇天山，与解放军展开了战斗，即天山保卫战<sup>29</sup>。

投奔李守信的还有不少其旧部。例如，在崔兴武手下时的祝韩三、张奎武等，都投奔李守信并被任命为自卫军的师长、旅长。祝、张二人决定扩大军队编制，计划在1947年4月，在林西、经棚同时“举事”，消灭驻林西的中共冀察热辽首脑机关，攻打林东、天山，向李守信驻地靠拢。这些情况被共产党侦查员掌握，1947年1月31日，祝韩三等人被捕，即所谓的“黑龙案”<sup>30</sup>。

#### （4）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迁往开鲁

李守信部队发展迅速，国民党发表李守信为热河省保安副司令，总司令依然由刘多荃兼任。1946年8月，国民党东北行营蒙旗联防指挥部于锦州正式成立，任命李守信为“热蒙各旗联防司令”，后由李守信推荐乌古廷担任<sup>31</sup>。

蒙旗联防成立后，管辖热辽边区各县的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表面上也表示协助李守信。于是，李守信按照陈明仁的指示到郑家屯设立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并招收兵马。这时，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东蒙古人民政府早已被取消，在其领导下建立的蒙古骑兵5个师也改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指挥，并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sup>32</sup>。李守信来到郑家屯以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2师两个团近2,000人也追随他而来。李守信将他们安置在郑家屯。而陈明仁驻郑家屯的一个师曾于黑夜突袭该两个团，企图消灭掉它，未果。陈明仁部队并未就此罢休，在蒙古骑兵团进城挂马掌和购买物品时，多方刁难，处处挤压<sup>33</sup>，大汉族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暗中处处受到陈明仁的排挤，1946年10月，李守信放弃在郑家屯招收队伍的计划，打算回阜新扩大队伍。途径沈阳时，开鲁遭共产党军队的逼近，东北行营命李守信速回阜新率领队伍援助驻守开鲁的陈明仁部队。李守信立即率领大军开向哲里木盟<sup>34</sup>。李守信的旧上司崔兴武和旧部下刘继广率部队在阜新福

<sup>23</sup> 前述注11文献，第43页，第55页。

<sup>24</sup> 35团由原阿鲁科尔沁旗保安队改编。额尔登格与塔拉巴率35团绝大部分官兵500多人叛变（全团共600多人），叛变后与李守信联系，请求收编。李守信任命塔拉巴为热北保安副总司令。后来，塔拉巴到沈阳。其后又与德王侄子阿拉坦瓦其尔等合流（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边防局编《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1950-1985》，1989年，第136页）。

<sup>25</sup> 阿鲁科尔沁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阿鲁科尔沁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9页，第866页；赤峰军事志编纂小组编，《赤峰军事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7-409页。

<sup>26</sup> 34团是从原巴林右旗保安队改编的。韩桑杰后被李守信任命为警卫队队长（翁牛特旗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翁牛特旗军事志 公元1295年-公元2005年》，2008年，第243页，第245-252页）。

<sup>27</sup> 37团由原扎鲁特旗自卫队改编。关于洪富升格与参谋长僧格嘎日布的叛变参见都瓦萨，《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四师三十七团》，《扎鲁特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第186-190页；《赤峰军事志》，第391页；《和子章与蒙骑四师》，第81-86页，第151页。

<sup>28</sup> 克什克腾旗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克什克腾旗军事志 公元前300年-公元2005年》，2008年，第28-29页。

<sup>29</sup> 前述注11文献，第45页；《赤峰军事志》，第391页。

<sup>30</sup> 前述注11文献，第65页。

<sup>31</sup> 前述注11文献，第42页。

<sup>32</sup> ナランゲレル「中共による内モンゴル騎兵部隊の解散までの軌跡」、『日本とモンゴル』第49卷第1号，2014年，第88页。

<sup>33</sup> 前注12文献，第125页。

<sup>34</sup> 通辽市军事志编纂委员会《通辽市军事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前述注11文献，第68页。

兴地、库伦的库伦沟与解放军交战。在库伦沟的解放军撤退后，李守信指示队伍向开鲁进发。11月，李守信军队重新夺取了库伦、奈曼和重镇开鲁。年末，“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迁往开鲁<sup>35</sup>。

### （5）兵败开鲁

李守信此次进入开鲁时这里已有两个势力，即驻扎在此的陈明仁下属军队陈天喜师派遣的王团，另一个是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的专员开设的专署，该专员兼保安司令。到达开鲁后，张念祖立即倒向了刘多荃的专员，但是李守信的部队实力依然比较强大。这样，在开鲁形成了三个势力。

李守信的军队主要有：在郑家屯时的两个团中的一个整团约九百人投奔而来；达理扎布的故乡鲁北县来的约八百人；阿鲁科尔沁旗的喇嘛塔拉巴与其弟额尔登格率领的近六百人；蒙骑4师其它队伍的叛兵等。由于开鲁地处军事要塞，陈明仁此时也赶来开鲁，拉拢分裂投奔李守信的喇嘛塔拉巴，意在压制李守信<sup>36</sup>。

12月下旬，解放军在开鲁附近进一步集结大量兵力。投奔李守信而来的其旧师长宋万里驻守开鲁城，在解放军接近开鲁时，不战而散。宋万里逃离开鲁后，塔拉巴和张念祖部队在开鲁南60里处与解放军交战，解放军失利暂时停止攻城。此战后，张念祖和塔拉巴的部队也都交给李守信带领<sup>37</sup>。

1947年初，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2师1,700多名士兵在阿思根将军的率领下接近开鲁城<sup>38</sup>。骑兵先迫使奈曼旗洛布登部队退入开鲁城内南街。李守信和陈天喜师王团驻守开鲁城。2月25日夜间，阿思根率骑兵攻打开鲁城，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26日冲进城内，李守信战败，逃离开鲁。这场战斗双方的主力是蒙古骑兵，是蒙古军的相互残杀<sup>39</sup>。开鲁曾经是李守信带领蒙古军起家发祥之地。

1946年4月以后，李守信在东部内蒙古地区迅速发展势力，召集、收编大量蒙古骑兵队伍，与中共解放军展开多次战争，致使共产党的党政机关撤出赤峰等地，对中共造成了很大打击。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阀大汉族主义的压制、国民党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等原因，终告失败。

## 二，1947年10月-1949年7月：沈阳、北平、南京、台湾

开鲁战败，军队被缩编，李守信回到了北平。形势紧张，逃往上海、台湾。最后由于德王的请求，前往阿拉善。

### 1，人民自卫军缩编

李守信从开鲁逃脱后，与余部约300人的队伍汇合，向彰武县出发。1947年3月1日抵达彰武县。2日，接到东北行营速来沈阳的指示。3日，离开彰武乘火车赴沈阳。4日抵达沈阳，次日会见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获得批准在沈阳休养。“人民自卫军”暂时由参谋长刘继广率领。刘继广部队在开鲁战后经通辽也向彰武撤退，与驻守彰武的陈天喜师部取得了联系<sup>40</sup>。

1947年5月，东北行营决定成立三个骑兵军，第1军军长包善一<sup>41</sup>，第2军军长王玉崑，第3军军长李守信。熊式辉召见李守信，指示迅速将人民自卫军整编为骑兵第3军。在同5月，赤峰被中共解放军占领。驻守在朝阳的陈明仁下属师因受到解放军进攻，请求李守信援助，李守信前去解围，解放军暂时撤退。不久，朝阳再次吃紧，李守信再次援助，解放军撤退后，李守信奉命进驻朝阳城内。

8月末，骑3军被缩编为新骑1旅。李守信被任命为行营中将军事参议，住沈阳。他推荐乌古廷任新

<sup>35</sup> 前述注11文献，第67-68页；前述注12文献第126-127页。

<sup>36</sup> 《伪蒙古军史料》，第128页。

<sup>37</sup> 前述注12文献第130页。

<sup>38</sup> 乌嫩齐主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52-163页。

<sup>39</sup> 前述注11文献，第67-68页；张万有，韩玉臣《开鲁的战略转移和再次收复》，《哲里木史志》，1986年第3期，第38-39页。

<sup>40</sup> 前注12文献，第133页。

<sup>41</sup> 1931年，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组织蒙古独立军时曾出任第1军司令。关于包善一等武装部队在东北地区的反共活动的详细情况参见《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072-1074页，第1086页等内容。

骑1旅旅长。不久，由关邦杰接任旅长。

从出关招收人马建立部队起，李守信及其部队一直被外牌相待，作战任务一个接一个，补给却很少，到处受挤压。此时的李守信尽管对于国民党很不满，但是事已至此，他也无能为力。在沈阳待了两个月后，于10月29日，请假回北平家中养病。在回北平的第二天，有国民党宪兵团的班长登门求见，理由是宪兵团有责任保护他及其家属的安全。李守信清楚，这是监视<sup>42</sup>。

1948年7月，傅作义在北平华北“剿总”召开会议，宝贵廷前来参加。会后，宝贵廷分别前去会见居住在北平的德王和李守信。

## 2，从北平到南京、台湾

1948年11月，宝贵廷在张家口养病，其部队在宝昌一带。这时，李守信在东北建立的新骑1旅也由苏和巴特尔<sup>43</sup>带领到了宝昌附近。与新骑1旅同时到达宝昌附近的蒙古骑兵部队，还有奈曼旗和巴林左旗的保安队。这样，自1945年8月以后分开在两个地区的蒙古军即李守信在东北地区的部队和宝贵廷在西部地区的队伍又重新会合。

李守信在北平期间，军统特务还不断鼓动他到热河省山区成立队伍，效劳国民党，未果。很快，北平局势紧张，1948年10月29日，李守信与家人飞往上海。到上海后，军统头目，以保护李守信的安全为名前来拜访。李守信知道这是逼迫他去南京，安顿家眷后来南京。1949年1月1日，德王也飞抵南京<sup>44</sup>。在南京，蒋介石接见德王和李守信，指示他们去定远营（今阿拉善巴彦浩特）组织蒙古自治运动。

1949年1月25日，德王乘机离开南京到达兰州，在此停留2个月。4月，去定远营。李守信在南京送走德王后返回上海。很快，上海局势也吃紧，1949年4月，李守信带家眷飞往台北。5、6月间，为成立“蒙古自治政府”赴广州请愿的德王从广州发电报给李守信，邀他来广州。6月28日，德王又派德古来飞到台北请李守信等前往广州。于是，李守信与德古来飞往广州。7月28日，德王、李守信等离开广州，经重庆、汉中、兰州、银川前往阿拉善定远营<sup>45</sup>。

在李守信从东北到开鲁再到东北的过程中，一直在各方面受到国民党军阀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但是他又不得不听命于国民党。而闲居北平期间，国民党特务以保护为名监视其活动，并施加压力企图使他离开北京再到地方招收队伍，继续为国民党卖命。而此次前往阿拉善，是因为德王的邀请。

## 三，1949年在阿拉善：德王的忠实追随者

8月，蒙古自治政府在阿拉善成立，不久，被迫向西北移动，到达接近边境的拐子湖。其后，李守信等人追随德王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sup>42</sup> 前注12文献，第135-138页。

<sup>43</sup> 苏和巴特尔，达尔罕王之侄，也称包三爷或高山。日本撤退后，组织成立科左中旗保安队，任队长。共产党建政时期，保安队改编为公安大队，苏和巴特尔任第2中队长。1946年7月下旬，苏和巴特尔率队叛变。在关邦杰之后任新骑1旅旅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击溃，后突围。按照乌古廷的指示，11月14日，率骑兵1千余人向西，与宝贵廷合流，成为德王定远营蒙古自治政府的军事支柱，任新编蒙古军第1师师长。1949年12月，与李守信等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捕。据苏和巴特尔1950年的自供，在1945-1948年的三年中，同解放军、共产党公安队进行重大战斗9次。1950年被遣送回中国，后被处死（内蒙古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公安工作大事记述》（繁本第一稿，征求意见稿），1986年，第38-39页。另外，该资料所记载“苏和巴特尔是达尔罕王之侄，又称包三爷或高山”的内容有待进一步证实）。关于苏和巴特尔与解放军战斗的情况还可参阅通辽市军事志编纂委员会《通辽市军事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第317页-332页；内蒙古自治区志·军事志编纂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志·军事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2-604页。

<sup>44</sup> ドムチョクドロン著 森久男訳『德王自伝』、岩波书店，1995年，第340页；《伪蒙古军史料》，第160-162页。

<sup>45</sup>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1984年，第162-163页；《德王在阿拉善》，第89-90页。

## 1，在宁夏：寄人篱下

1948年12月-1949年1月间，董其武下令将新骑1旅<sup>46</sup>和宝贵廷的第3总队都归宝贵廷指挥。此后一段时间，宝贵廷部队一直在厚和附近。

1949年5月，宝贵廷为投奔德王率领部队西移固阳。经乌拉特中旗同义隆等地，7月到达宁夏布隆淖尔。由于给养困难，经宝贵廷、李守信与马鸿逵交涉，新骑1旅由宁夏收编，暂归宁夏军阀马敦静（马鸿逵次子）指挥，给养等一切由宁夏省负担。但是，马敦静只允许宝贵廷率蒙古骑兵驻在黄河以东的陶乐县，不许进入黄河以西的阿拉善地区<sup>47</sup>。

8月10日，德王和李守信组织的蒙古自治政府在定远营正式成立。李守信被选为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宝贵廷从部队中选派内蒙古东部和察锡各旗的代表洛布登，乌尔塔，诺尔布达那等30多人，前往定远营参加成立大会。

此间，李守信和乌古廷在宁夏与马敦静多次交涉，请求允许宝贵廷部队进驻定远营，马敦静不予答应。不久，马敦静以兰州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名义，任命李守信为陕甘宁边区骑兵总司令，率领新骑1旅归宁夏兵团指挥。李守信当即表示反对，而马敦静以这是马步芳的命令来压制李守信。时至8月下旬，李守信有意去绥远，但是傅作义已来绥远，此次，傅作义仍坚决拒绝李守信来绥<sup>48</sup>。关于国民党军阀傅作义的大汉族主义及其对少数民族的极端歧视和残酷压迫，从他与欧文·拉铁摩尔的一段对话可见一斑。拉铁摩尔非常谨慎地讲述蒙古自治的问题，“听到这里，傅作义忽然破口大骂道：‘蒙古人里没有像你我这样的文明人。蒙古人不是人，他们是牲口。如果他们干活，就喂养他们。要是不驯服，就揍他们’”<sup>49</sup>。

此时，解放军向西北进攻，宁夏形势紧张，吴鹤龄、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于宝衡、乌臻瑞等先后飞往台湾。不久，马敦静令李守信部队去三边（陕北的定边、安边、靖边）打游击抵抗共产党军队。李守信用身上仅有的现洋8元买了口小猪让官兵吃了一顿肉，带部队向三边出发。后又接到马敦静的命令回到陶乐县。李守信率部队退回陶乐县时，仍有人率队伍前来投奔，均被李守信拒收<sup>50</sup>。

## 2，被捕：从阿拉善拐子湖到蒙古人民共和国

9月中下旬，绥远、宁夏相继被共产党军队占领，李守信率部沿黄河东岸向北，后向西渡过黄河到磴口，在磴口有400多人马离开李守信部队投奔绥远的国民党军刘万春。从磴口向定远营方向去寻找德王，行至距离定远营200里处时，碰见洛布登前来寻找李守信，得知德王已于9月20日<sup>51</sup>离开定远营前往阿拉善北部的图克木庙，便也向那里进发。德王在途中听闻李守信也在向图克木庙行进，便宣布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副总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总司令部下设2个师，第1师师长苏和巴特尔，副师长孙明海；第2师师长吉利占太，副师长塔拉巴。军队共一千多人<sup>52</sup>。

10月初，李守信抵达图克木庙。这时，德王一行已先行到达，且已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哈拉尔格<sup>53</sup>与蒙古内防处处长巴雅尔见面。德王返回图克木庙后，由于给养困难，经过与阿拉善旗保安队长派遣的代表阿拉善旗北部防卡队长段塔拉腾岱等人协商，德、李决定向西北的额济纳旗境内的拐子湖移动。11

<sup>46</sup> 此时安恩达任新骑1旅旅长，苏和巴特尔、孙明海为副旅长（前注12文献，第164-166页）。

<sup>47</sup> 德王自述，第170页；卢明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第380页。

<sup>48</sup> 前注12文献，第181页。

<sup>49</sup> Owen Lattimore, Compiled by Fujiko Isono, *CHINA MEMOIRS, Chianm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p30-31；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26页。

<sup>50</sup> 前注12文献，第181-182页。

<sup>51</sup> 《德王在阿拉善》，第171页；德王自述中为旧历8月2日（德王自述，第173页）。

<sup>52</sup> 德王自述，第173-174页；还有说法认为此时的蒙古军有2千余名，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边防局编，《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1950-1985》，1989年，第214-215页。

<sup>53</sup> 德王与蒙古方面原先约定在乌盟境内的巴彦陕丹会见（德王自述，第192页）。

月底率部向西北行进到巴伦沙尔札，后抵达拐子湖。

12月29日，德王来到察干套老盖与蒙古方面的巴雅尔再次会见。临行前，一切交由李守信负责代理，约定以21天为限，德王一定回来。德王出发时，蒙古自治政府的所有军政首脑人员都出来送行，一一握手，李守信对德王说：“你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好好地联络吧，我也打算去，就是栽跟头也栽在蒙古地方，决不栽在八路手里”。过了一个多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送来德王信件，指示李守信、苏和巴特尔等6人来边境察干套老盖开会<sup>54</sup>。途中，德王又来电，指示李守信等改去乌兰巴托开会<sup>55</sup>。李守信一行到达乌兰巴托后被捕，1950年9月18日被遣送回中国。

从台湾返回到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期间，李守信一直有机会重返台湾，然而在最为关键也是最艰难的时刻，他没有选择离开德王，而是与德王走到最后。

#### 四，特赦后的李守信生活点滴

被引渡给中国的李守信的审判和定罪判决，在狱中是如何度过的等等，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无从得知。目前我们只知道，于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特赦令，认为李守信“经过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予以释放。距离1950年被引渡中国后，已经过去了近15个春秋的岁月。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于1964年7月31日制作的《战争罪犯处理报告表》记载，释放前的李守信被关押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内，表中还记载，李守信军衔为上将。

获释的李守信和德王一样，被安排在位于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文史研究馆担任馆员。自从1945年8月到达北平时起，到1949年8月在宁夏辗转之际，李守信一直希望重新回到厚和率领蒙古军，终因傅作义的阻挠未能实现。特赦后，实现了他的愿望的一半，回到了厚和，却是今非昔比。文史馆给李守信配备了秘书刘映元。2015年，笔者得知，刘映元也已去世多年，但仍怀着一线希望，多方打听与李守信有过接触的人员，收获甚微。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位知情人，进行了采访。

2015年8月21日，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机关办公楼6号楼）会见该馆馆员李某（男，57岁），访谈了李守信当年的情况。李某的父亲是文史馆员，双目失明，上下班时由李某陪伴来往于住处和办公室之间，经常见到李守信。那时虽然年龄尚小，但还是有一些记忆。以下是李某的回忆：

李守信是位非常和蔼慈祥而且健谈开朗的老人，身高大约1米8左右，比较魁梧，但是，由于腰腿疼，走路时需要拄着双拐，上身向前倾斜大约成直角，从来没见过他直腰。在家里时，习惯坐在炕上，拐杖总是靠炕沿竖立停放。李守信一个人生活，在我们看来，经济上比较富裕，经常给孩子们一些糖果之类，孩子们都特别愿意去他家里，因此，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至今记忆犹新。

李守信住处是平房，有个小院子，三间房，中间是客厅，东屋相当于书房，西屋有南炕，炕上放个炕桌，冬天生炉子取暖（这与李守信自述附录中的描述基本吻合一笔者）。手上戴着块非常好的手表，还有支派克笔。有个新城满族人给他挑水倒垃圾。李守信的工资不怎么花，总是顺手放在褥子底下。

李守信对于监狱里的生活几乎只字不提，说喂兔子是他在监狱里唯一的工作。文革中，人们都躲避这个特殊人物。文革结束后听人们议论，其实，李守信是个非常灵活、务实的人，并不固执。

在文革时期，人们虽然对他敬而远之，但没人敢惹他。据说，有一次，从东北来了两个干部，一男一女，来做外调，也就是向李守信询问被调查者的历史情况。那个女干部也许已蛮横成性，不知深浅地对李守信说“你老实点”，被激怒的李守信拿起放在炕沿边的拐棍就要打那个女干部，被同来的男干部劝阻。后经男女干部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sup>54</sup> 德王自述，第188-200页。

<sup>55</sup> 《伪蒙古军史料》，第187页；德王在自述中指出，李守信一行到达乌兰巴托后，蒙古方面并没有通知德王。德王和李守信等人在乌兰巴托的见面是在被捕后审讯时的对质作证（德王自述，第207页）。

还常听李守信给人们讲，从他住的江南馆巷到文史馆的路上，经过街心花园，路倒是并不远，但因腰腿疼痛，总是在公园的椅子上休息一会儿。一天，两个小偷企图抢劫他的手表，被李守信用拐杖打跑了，“虽然虎落平川，但不能被犬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不看看老子是谁”。

根据当时大人物的传论，他的死去，有些蹊跷，是那个帮他挑水的人发现的，文史馆听到消息，办公室主任赶去的时候，手表和派克笔都不见了，褥子底下的钱也不知道是不是少了。

笔者还向李某询问了关于李守信在日本战败后的选择的问题，他指出，他记得李守信也说过，当时，他并不知道共产党和傅作义有什么区别<sup>56</sup>。

## 五，骨灰的安置：李守信堂孙访谈

李守信于1970年5月去世，那么，他的骨灰去了哪里？在他的家乡会不会有其亲属？

带着这样的疑问，2015年8月29-30日，笔者到辽宁省北票市马友营蒙古族乡大庙村（照片9，10）采访了李守信的堂孙李贵民。李贵民家看上去与其他人家并无二致，但是，家里摆放的李守信与德王的合影照片却表明了他的身份（照片11）。李贵民，1954年5月出生于大庙村（照片12）。大庙村即李守信的出生地，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的古力古畜大庙村，而现在，人们早已忘记了古力古畜这个名字，只称为大庙村。村落四周有帽子山等山脉环绕，山势不高，郁郁葱葱，长满了各种树木草丛，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照片13）。

李贵民称李守信为老爷，即最小的爷爷。下面是李贵民的讲述。

我的祖父李君，是李守信的大哥，二哥叫李臣，李守信排行老三，也是兄弟中最小的。李君有三个儿子，长子李景阳，次子李景堂，三子李景荣。李景堂曾留学日本，因为是个强烈的反共分子，土改时被枪杀。我父亲李景荣有四个儿子，大哥在大连，二哥去世早，43岁时病故，我排行第三，四弟在沈阳。

李守信的三个儿子李景凡、李景芳、李景元都在台湾，现今虽年事已高，但都健在。大陆和台湾关系缓和后，台湾方面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李守信去世后，王治平将骨灰接到北京（当时唐成良也已去世），1971年清明节时北京的大堂哥把骨灰送到大庙村，安葬在这里。李守信终于又回到了故乡。2000年10月5日，李守信的两个儿子李景凡和李景元从台湾来到大庙村，祭拜父亲，并立了墓碑（照片14，15）。

李守信的墓地在在大庙村西面大约400米处的小山洼上，守望着村落。站在墓地旁，整个大庙村尽览无余，隔过村子，可以望到对面的帽子山，即李守信的坟墓与帽子山隔村相望。墓地有1个石碑，4个土坟。阴历7月15日刚刚祭过，所以坟头上还压着崭新的纸钱。石碑是李景凡和李景元于2000年建立的，上面镌刻的“永世怀念 李氏宗親之靈墓”（墓碑左侧刻有“公元二千年”、右侧“北票市馬友营乡大庙村”）的碑文也是李景凡的手迹。站在石碑的旁边，面向土坟，左手前面是李守信的坟墓，后排是李贵民的父母，右手前面是李贵民祖父祖母，后排是李贵民的大伯的坟墓（照片16）。

李贵民的家住在从北票通往小塔子的长途汽车公路西面约150米处（照片17）。紧挨着公路的东侧就是李守信的故居，在大庙商店北侧（照片18），建筑早已形影无踪，现在是别人的住地。李贵民回忆，古力古畜大庙也被毁坏，其位置就在公路西侧，与李守信的旧居仅隔一条公路，非常近，距离李贵民的住家只有100米左右。

他还告诉我们，当地的地名中带有“营”字的过去是蒙古族村落，带有“沟”字的是纯汉人村落。而

<sup>56</sup> 可以与《李守信自述》第340页等内容相对照。

现在，即使名义上是蒙古人的村落，也都已汉化，蒙古人也都不会讲蒙古语了。他们的村子有100多户人家，500人左右，蒙古族约占一半，而会讲蒙古语的只有几位80多岁的老人了。

在交谈中，李贵民讲得最多的是在文革中遭受的辛酸苦难。之所以遭到欺压，只因为是李守信的后裔。在这里，摘录其一小部分。

“父亲李景荣生于1914年，大房太太生下一女后去世。父亲于1947年娶了第二个妻子，即我的生母。母亲刚嫁到李家不久，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北票开始了土地改革。因为我们李家是村里的首富，加上李守信的缘故，便成为土改的第一个对象。我们家族为了躲避风险，都去了北京投奔李守信，但是，没过多久，北京也乱了。

解放后，我们被赶回老家。回家时一家4口人，奶奶、父母和姐姐，母亲有身孕怀着大哥。回到了家乡却没有了住处，原来的家产和土地早已全部被没收，分给了贫农和贫下中农们。我们真正成为了一无所有的赤贫。一家人轮流借住亲戚家，没有人愿意收留地主家庭，因此不得不经常搬家。母亲生大哥时暂住一个远方亲戚家。当时，人们都躲着我们，担心引火烧身，惹上麻烦。大哥比二哥大3岁，二哥比我大2岁，有一个妹妹，四弟是1963年出生。

父亲因吸食大烟身体不好，于1963年去世，当时我只有9岁。弟弟还小，上面的兄弟3人给生产队放羊。大地主的老婆家庭成分不好，又死了丈夫，孩子们幼小，没有家住，借宿人家，母亲的艰难辛酸可想而知。白天都去劳动，母亲也必须参加劳动，晚上被叫去‘学习’。名义是‘学习’，实际上是批斗，地主的老婆孩子，被批斗是理所当然的。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受尽欺辱，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比肉体上的折磨更为痛苦的是心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遭受无端的指责、欺负和虐待，倍受孤独、被排斥的煎熬。我只读到小学2年级，被迫辍学。其实，我们有什么过错呢？我们没做过任何坏事。”

在采访中，李贵民多次感叹“没有知识是最可怕的，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不是我不愿意学习，是没有机会”。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李贵民一直说不上媳妇。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至2003年在村里当会计，1982年才结婚，在农村属于少有的晚婚。长子与长女分别于1983年和1992年出生。

李贵民性格开朗，为人诚实热心，因此，文革结束后，村子里也曾打算让他当小学教师。但是，只读过2年级的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他还告诉我们，母亲一生遭受了无尽的灾难和委屈，却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于1978年去世。在采访过程中，我感受到，命运多舛的李贵民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机智而且有思想的人。

## 结语：李守信在德王政权中的作用

如何评价李守信，是个难题。原因在于他的经历比较复杂。他是德王政权的2号人物，先后与日本、国民党、共产党各方面的要员打过交道，曾经叱咤风云。同时，他还是一个传奇人物，刘映元指出，他在一生中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战争，身上没有留下一块伤疤，不得不说是个奇迹<sup>57</sup>。日本撤退后，李守信受命为国民党奔走，最后在1949年初夏，出于德王的要求，从台湾回到内蒙古，追随德王重组蒙古自治政府。

其实，无论在早期还是在1949年的蒙古自治运动中，李守信在德王政权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早年的察东特别行政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1933年2月21日，热河事变（热河战役）爆发，3月4日，汤玉麟不战放弃省会承德，热河全境沦陷。3月5日，崔兴武在林西将部队交给李守信。4月初，李守信部队被日本关东军改编为热河游击师<sup>58</sup>。5月，李守信赶走占领多伦的刘桂堂军队，进入多伦。8月，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李守信在多伦设置了察东特别行政区，任行政长官，满洲国派遣顾问协助统治。

<sup>57</sup> 《李守信自述》，第353页。

<sup>58</sup> 同上注文献，第121-127页；热河游击师也称兴安游击师（松崎陽「内蒙古軍の成立」『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7卷第2号，第1-3頁）。

这一察东特别行政区即李守信军政府便成为日本方面“内蒙工作”的据点。随之，李守信部队于9月改编为“察东警备军”，规模9千人左右<sup>59</sup>。

原本，满洲国与占领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军阀宋哲元第29军经常发生摩擦，察东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尤其是进入1934年以后，双方冲突变得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势下，1935年1月，日本决定改变以前的以培养亲日势力为主的政策，转变为扶持成立地方独立政权。1935年12月，发起察东警备军进占察北六县的“察东事件”（六郡事件），12月31日，李守信军占领张北（照片19）。1936年1月22日，在张北成立了以德王、李守信、卓特巴扎布（卓世海）为中心的察哈尔盟公署<sup>60</sup>。1936年2月10日，在察哈尔盟公署的基础上建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12日，蒙古军政府成立。有观点认为，蒙古军政府的基础便是察东特别行政区<sup>61</sup>。李守信曾两次访问日本<sup>62</sup>，并在一些重要讲话中明确表示对日本的依靠，指出在日本的大力支持下，蒙古军队正在不断强大<sup>63</sup>。

察东特别行政区是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总司令部以及蒙古军政府的重要基础之一。李守信也承认，“那时在关东军卵翼底下，已经清楚地看出有三个蒙古组织：一是百灵庙的蒙政会；一是伪满的兴安军；另一个便是我的察东警备军”<sup>64</sup>。在德王政府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李守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守信与德王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涯始终是紧密联系相随相伴的。

1945年以后，追随李守信的官兵中，有不少是其旧部下。例如，李守信带领旧部下刘继广和郭秀珠前往东北出关组织人马时，原蒙古军第3师师长宋鹏九也追随李守信到热河和开鲁，被任命为师长。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在蒙古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声望<sup>65</sup>。

李守信的祖籍是山东，然而几代人生活在蒙古地区，成为了“随蒙古”<sup>66</sup>。他在1933年以后尤其是1949年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表现出他是一个极端的反赤色的民族主义者。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他的意识接近汉族”<sup>67</sup>。由于资料的欠缺等制约，对于李守信尚不能进行全面的叙述，但是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思。第一，关于镇压嘎达梅林起义，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如何叙述的，也许永远是个不解之谜，而他在晚年为什么特意交代镇压并枪杀嘎达梅林的真相呢？或许是因为他长期经历了军阀大汉族主义的欺凌和压制之后，对于血气方刚、鲁莽的年轻时代有了反思和悔悟。第二，1949年夏，德王身边的不少人员纷纷离开大陆逃往台湾等地时，李守信却选择了留下来，坚持到最后。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往往难以一言蔽之，正因如此，更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去接近事实，才能够以史为鉴，警示后人。

## 参考文献

### 蒙古文·欧文

Bayannamur, 35-dugar qoriya-tai qolbugdal бүкүй көмүс болун керег yabudal-un tuqai ergičegülül. *Aruqorčın-u suyul teüke* (4-düger debter). 2003on.

Köke tu γ qoriya, *Köke tu γ*, 89düger qu γ ucha γ a, 1943. 1. 13.

Surtaltu orČi γ ulba, *DemČigdongrub-un to γ aČilta*, Öbür mong γ ul-un arad-un heblel-ün qoriya. 1990on. Čidaltu, Ülügei nutug-un urguga bosuga edür-üd tu. *Aruqorčın-u suyul teüke* (2düger emhitgel), 2008on.

<sup>59</sup> 稲葉正夫「関東軍の内蒙工作（一）」、『国防』昭和38年4月号，第62页；《李守信自述》，第135-136页。

<sup>60</sup> 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みすず書房，1964年，第492-500页；前述松崎著述，第17-20页。

<sup>61</sup> 稲葉正夫「関東軍の内蒙工作（二）」、『国防』昭和38年5月号，第80页。

<sup>62</sup> 关于第一次访日时间，李守信自述中认为是1939年的春夏之间（《李守信自述》，第299页），德王认为是1938年秋（《德王自述》，第79页）。第二次访日时间，李守信和德王都认为是1941年2月11日从张家口出发（李守信自述，第308页；德王自述，第107页）。

<sup>63</sup> Köke tu γ qoriya : 89düger qu γ ucha γ a, 1943. 1. 13.

<sup>64</sup> 《李守信自述》，第139页。

<sup>65</sup> 松井忠雄『内蒙三国志』，原書房，昭和41年，第142-145页。

<sup>66</sup> 《李守信自述》，第2-3页。

<sup>67</sup> ドムチョクドンロフ著 森久男訳『德王自伝』，岩波書店，1995年，第509页。

Owen Lattimore, Compiled by Fujiko Isono, *CHINA MEMOIRS, Chianm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 汉文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德王在阿拉善》,阿拉善盟文史第5辑,1988年。

阿鲁科尔沁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阿鲁科尔沁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

赤峰军事志编纂小组编,《赤峰军事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

赤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子章与蒙骑四师》,1989年。

都瓦萨执笔,《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四师三十七团》,《扎鲁特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

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克什克腾旗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克什克腾旗军事志 公元前300年—公元2005年》,2008年。

卢明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

奈曼旗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奈曼旗文史资料》第1辑,出版年代不明。

内蒙古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公安工作大事记述》(繁本第一稿,征求意见稿),1986年。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边防局编,《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1950—1985》,1989年。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1984年。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守信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1985年。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伪蒙古军史料》(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8辑),1990年。

朴樞著,游娟鏗译,《中日战争与鸦片(1937—1945)——以内蒙古地区为中心——》,台湾:国史馆印行,1998。

石国清,席卫中编《北票文史资料第二辑》,政协北票市委员会,2003年。

稻奋主编《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2号,民国25年11月1日出版。

乌嫩齐主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

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张万有,韩玉臣《开鲁的战略转移和再次收复》,《哲里木史志》,1986年第3期(总第10期),《哲里木史志》编辑部。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 日文

稻葉正夫「関東軍の内蒙工作(一)」、『国防』昭和38年4月号。

-----「関東軍の内蒙工作(二)」、『国防』昭和38年5月号。

島田俊彦、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みすず書房、1964年。

ドムチョクドンロプ著 森久男訳『徳王自伝』、岩波書店、1995年。

ナランゲレル「中共による内モンゴル騎兵部隊の解散までの軌跡」、『日本とモンゴル』第49巻第1号、2014年9月。

松井忠雄『内蒙三国志』、原書房、昭和41年。

松崎陽「内蒙古軍の成立」『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7巻第2号、日本モンゴル協会、1983年。

森久男編著『徳王の研究』、創土社、2000年。

楊海英『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文藝春秋、2014年。



照片1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要人。前排中央为德王，其右侧李守信（1938年）



照片2 德王机前的德王和李守信（引自 森久男『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



照片3 蒙古军总司令官 李守信（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照片4 李守信（左）和周佛海（《国际画报》第16卷第3号，1940年3月）



照片5 左起：德王，李守信，张景惠（《蒙疆年鉴》成纪738年，昭和18年，蒙疆新闻社）



照片6 正副主席就职仪式，左起李守信，德王（《蒙疆年鉴》成纪738年，昭和18年，蒙疆新闻社）



照片7 李守信特赦令



照片8 蒙古军队列（摘自森久男『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



照片9 大庙村卫生室



照片10 右侧为大庙村政府，左侧村卫生室



照片11 德王和李守信（李贵民提供）



照片12 李贵民



照片13 大庙村和帽子山



照片14 李守信墓碑



照片15 李贵民与李守信墓碑



照片16 墓碑与帽子山守望着大庙村。4个黄点是土坟。



照片17 李贵民家



照片18 大庙商店，北侧是李守信故居，公路西侧约150米处是李贵民家。



照片19 察北驻军图（韬奋主编《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2号，民国25年11月1日出版）